



爲和平而戰鬥

威·愛·柏·杜波依斯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爲和平而戰鬥

威·愛·柏·杜波依斯著

〔附：秀萊·格拉漢的補充說明〕

辛 華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北京

W. E. B. DU BOIS
IN BATTLE FOR PEACE
The Story of My 83rd Birthday
(With Comment by Shirley Graham)
Published by Masses & Mainstream
New York, 1952
根據美國羣衆與主流雜誌社一九五二年版譯出

爲和平而戰鬥

[美]威·愛·柏·杜波依斯著

辛 華 譯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乾面胡同2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1號

印刷者 財政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定 價 每 本 七 角 八 分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8 $\frac{3}{4}$ ·插頁 2·字數 158,000

1953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3·508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美國黑人學者杜波依斯自述他爲和平而鬥爭的著作。他從幼年時代寫起，一直到他投入和平運動、組織「和平宣傳站」、被美國統治階級以所謂「外國主謀人的代理人」罪名起訴以及在國內外人民正義的支持下獲得最後勝利被宣判無罪止。對美國政府宣布和平爲非法的這種企圖進行的英勇鬥爭，是本書的主要部分。著者以動人的文筆敘述了覺悟的美國人民和進步的工會怎樣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聯合起來，擊退了控告和平的陰謀。書中有幾章後面附有杜波依斯夫人秀萊·格拉漢的補充說明。此次重版，附錄中收入了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杜波依斯在北京大學師生爲他舉行的祝壽會上的講話。

目 錄

第一章	關於生日	一
第二章	非洲事務委員會	二三
第三章	我的旅行的習慣	二〇
第四章	和平大會	一七
第五章	和平宣傳站	一五
第六章	我的競選參議員運動	五三
第七章	起訴	六四
第八章	生日宴會	六六
第九章	被起訴的罪犯	六九
第十章	爲辯護而奔走	二六
第十一章	哦！約翰·羅奇這個人	二八

第十二章 審訊.....二六二

第十三章 宣判無罪.....一九三

第十四章 解釋.....三三

附 錄

在莫斯科全蘇擁護和平大會上的演講.....杜波依斯 二五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判決以後.....二五四

後記.....秀萊·格拉漢 二六

非洲，站起來！面向升起的太陽！.....杜波依斯 二六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大學師生爲他舉行的祝壽會上的講話)

再版後記.....二七六

第一章 關於生日

在我童年和青年時代有沒有像這樣特別注意過生日，我不記得了。可以肯定，不會有過什麼和七月四日的爆竹、秋天的「家畜展覽」、聖誕節的禮物以及聖誕樹等同樣重要的慶祝。的確，我記得一直到我二十五歲生日——那時我在柏林求學——我才慶祝了一下。那是北德的漫長而陰黯的冬天，我生活得很舒適，但同時又感到有一些孤獨，感到和家鄉以及童年的朋友都遠離了。我在柏林紹尼堡我的房間裏點起了蠟燭，並以我的小學圖書館來紀念我的母親，我還寫了幾句相當感傷的關於一般生活的話：

「我奮鬥着，想盡可能使我的生活過得像個生活的樣子——我祇要給這種奮鬥定一個限度，使它和我的兄弟姊妹們爲了同樣生活而進行的奮鬥不發生矛盾。現在，困難的問題就是，不知道這個限度在那裏……天曉得，我真是惶惑得很。我深知我自己的最大發展並不是和世界的最大發展一致的，現在我願意犧牲……爲全世界的利益而奮鬥這種一般的提法，很快就成爲令人生厭的感傷的東西。因此，我對世界有了這樣的看法：前途是在自己的手裏，我並且要爲黑人的解放而

奮鬥，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最大發展就是世界的最大發展……」

我的第一次真正的生日慶祝是在五十歲生日，那天在紐約市公民俱樂部舉行了宴會。這個俱樂部在五馬路附近第十二街，位置很好，會員分屬許多種族。它的前身就是自由俱樂部，而爲了要我加入自由俱樂部，華爾特·李普曼還和社會學家弗蘭克林·吉丁斯作過鬥爭——大概在這件事過後不久這個自由俱樂部就解散了。參加公民俱樂部的宴會的人不多，空氣很融洽，我接受了一只銀質的愛杯，上面刻着：

「給作家、學者、先知威·愛·柏格哈德·杜波依斯，慶祝他的五十壽辰——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對他的偉大天才致以由衷的崇敬，對於他貢獻他的天才爲他的種族服務表示感謝。」

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各分會敬贈」

以後的一次宴會不是在生日那天而是在一九二四年我從歐洲非洲回來以後舉行的。紐約薩瓦林咖啡館裏面的節目很動人。里奇利·托倫斯朗誦了韋特·賓納的一首詩——「給杜波依斯和他的人民」。赫伍德·布羅恩講了話，大家唱了哈利·柏爾雷改作的聖歌。詹姆斯·威爾頓·約翰遜宜讀了佐那·蓋爾的祝辭。羅伯特·本奇萊，華爾特·漢普頓和副州長都講了話。尤金·奧尼爾還寄來一封短簡，上面寫的是：

「在我看來，今天做一個黑人作家一定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他們的內心存在着一個獨立的深刻的現實世界。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還可以向命運要求什麼比他們的這種罕有的機會更好的禮物呢？他們是幸運的。他們之所以有這種幸運，杜波依斯博士的功勞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大；因為他完全以自己卓越的才能首先使世人知道：他們必須用真正尊敬藝術的態度來期待黑人對現代文學的貢獻。」

康蒂·庫倫朗誦了一首詩：

「人們在你的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

峻險，而且黏滑不堪，

然後抑制住他們自己的狂怒，

看着你一步步向上攀緣。」

我也講了話，大意是：

「人類正向着一個理想前進，但是，上帝明鑒，要達到目的，靠貪圖安逸離羣索居的人是不濟事的，他們遇事猶豫不決，追求輕鬆和舒適，今天，就和過去一樣，我們要在另外一種人的驚心動魄的力量推動下前進，他們是這樣的人：他們不能眼見被剝奪權利的和被糟蹋的人們輾轉溝

緊、沿門求乞而無動於中地靜坐。他們浴着鮮血和塵土，從事戰鬥。他們咒詛這醜惡的世界毫不留情。他們像古時上帝那樣，鄙棄冷淡的騎牆分子；他們高聲叫喊，不遺餘力；他們向世間宣傳，他們使這個世界由於承受不了邪惡的重担而萬分難受，不得不設法改善，並且的確改善了一些。」

我的多年的摯友和同事奧古斯特斯·迪爾爲我週密地安排了這次美滿的宴會。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喬埃爾·斯平加恩抽不出身來主持，但是他寫了一封短簡給我說：

「我祝賀你的社會工作，我也祝賀你的語言的力量，你以這種力量使你的工作已有成效。我知道有些人認爲一個藝術家是一個無話可說的人，他寫作就是爲了證明這一點。世界上的偉大作家對他們的工作不是這樣看的，你也不是。雖然你的事業大部分是教師和預言者（不僅僅是一個種族或民族的，而是全世界的）的崇高事業，但是我看美國的藝術家們未必寫得出比『黑水』和『黑人的靈魂』中的某些篇章更美的東西來。」

我的七十歲生日是在亞特蘭他大學過的，過得相當講究。亞歷山大·波特諾夫爲我塑了一座銅胸像；喬·斯平加恩和詹姆斯·威爾頓·約翰遜講了話；布雷斯威特朗誦了一首祝壽詩。

儘管有些人覺得鋪張了一些，但是這一切都是很令人鼓舞的。當然，我是喜歡這樣的，但是我漸漸地對這一類的慶祝感到有些膩了，理由有二：第一，我認爲這對於我的那些時運不濟的朋友們是一種勒索。宴會和禮物的費用一定相當可觀，而且很少人有足夠的勇氣來拒絕合作。第二，這一類的慶祝對「年齡」的意義加以令人很不痛快的強調。每當人們提到我的名字或工作的時候，他們似乎必須附帶提到我的年齡，這已開始成爲慣例了。言外之意就是：我的這一段未免長得過分的生涯，已經快到盡頭，很難期望我再繼續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充沛的精力了。因此，趕快、趕快、拉這個老頭子「一把」吧！

把老年人當作是反常的和無用的人，這種傾向是美國特有的。法國和英國都不是這樣，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也不是這樣，亞洲和非洲更不用說。在美國，與強調青年（這種強調早已失去了它的意義）的同時，還有一個古老的習俗，這就是：如果人們過了五十歲，那末，即使不把他們的年齡作爲純粹虧損，也要把它作爲負債而在社會工作上註銷掉，而如果他們到了七十歲，那就乾脆祇當他們已經死了。

因此，我下定決心不再舉行這一類的慶祝，好減輕我的朋友們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好讓人們仍舊根據我的工作效率，而不是根據工作年數來評判我的工作。但是當我在一

九四四年回到紐約和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時候，我的八十歲生日却成了歡迎我重返舊地的相當自然的一個機會。於是，我的這個很好的決定只好取消。這次慶祝是在羅斯福飯店舉行的。阿爾瓦·密達爾和古納爾·密達爾對她表示「敬愛」；亨利·華萊士表示：「對你多年來爲人類事業服務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希望你繼續給那些你不打氣就不敢說話的人們以勇氣。」不久以後，這位要求給人打氣的人自己却洩了氣。

我謝絕八十一歲和八十二歲的慶祝會，結果無效。於是我採取了堅決的態度，特別是當最後這一次宴會在誰當主席的問題上引起一場令人不愉快的爭執的時候。我堅決主張由我自己決定我自己的生日宴會的主持人。我這樣做了，然後我說：「不再舉行生日慶祝了！適可而止吧！」但是在一九五一年，由於我對非洲久已深感興趣，經過勸說後，我又改變了這個決定。

補充說明

在有幾章後面附一些說明，是爲了要告訴讀者一些有關的個人情況。我斷斷不敢擅自對威·愛·柏·杜波依斯的事實或風格有所增益。他的事實或風格非常平易近人，不

需要作任何說明。這一欄的標題說明了我寫的這些東西的特性，讀者也許可以從這些個人的補充說明中得到一些樂趣。但是這個標題也可以看作法文的「Comment」，如果加上問號，把這個字譯成日用英文「怎麼來的？」最爲確切。

例如，依我看來，時常舉行他的生日慶祝會並不，如威·愛·柏·杜波依斯所想像的那樣對「時運不濟的朋友們」是負擔。因爲，至少五十年以來這個人在合衆國的歷史方面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范·懷克·布魯克斯在「充滿信心的年代」中寫道：

「這位黑人文人政治家……從事改造種族命運的工作……反對調和手段，爲提高教育而戰鬥。這位卓越的領袖，有才識的人，是又熱情又敏銳，又幽默又公正的藝術家和預言者，青年利益的顧問和支持者（他在「危機」上刊載他們的作品），同時也有着淵博的學識。他關心着與哈萊姆區（泛非事業的文化首都）有關的重大問題，美國黑人在非洲的未來發展中可能起的作用以及更爲廣泛的一切有色人種的問題。」

亨利·斯梯爾·康馬格爾發表了他所認爲「引導我們思想的人」的六十一位美國人的名單。在這個名單裏，他把杜波依斯的名字和本傑明·弗蘭克林、湯馬斯·傑弗遜、馬克·吐溫以及約翰·杜威的名字並列。約翰·根室在他的「美國內幕」中說，杜波依

斯的「地位差不多和蕭伯納、愛因斯坦的地位一樣，是他這一方面的最可尊敬的、最卓越的領袖」。

雖然杜波依斯在他的考慮中容易忽視這種判斷，但是他還是驕傲地把喬埃爾·斯平加恩的一封信簡附在書裏了。斯平加恩大約從一九一二年到逝世，一直是他最親密的朋友。

喬埃爾·斯平加恩是一個詩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文學教授。但是由於他太熱心抗議他的一個教授同事的被無理解聘，他自己也觸怒了學校當局。尼科拉斯·墨萊·巴特勒禁止把哥倫比亞大學的事件傳揚出去。斯平加恩教授不能沉默，於是他也被解聘了。斯平加恩不僅認為這種解聘的行動侵犯了正義和學術自由，而且因為在這個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有人無禮地提醒他，說他，斯平加恩，是一個猶太人。從這個考慮出發，他開始注意歧視和種族偏見的問題。他認識威廉·英格里希·瓦林、奧斯渥爾德·加里遜·維拉德和查爾斯·愛德華·魯塞爾，他們不久以前曾和另外一些人共同努力籌組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斯平加恩到這個協會辦公的地方去訪問時遇見一個矮小的、機敏的棕色皮膚的人正在熱心地編輯一份他稱為「危機」的雜誌。本來僅僅這一種文學活動就足以使這位前任英文教授大感興趣的，但是現在這個人本身以及他的哈佛口音和大陸風度引

起了他的好奇心。經過幾個星期的詢問和調查以後，喬埃爾·斯平加恩以整個身心投入了這種爭取人權的先鋒隊的令人興奮的工作。他接受了這位非凡的杜波依斯博士的信條：

「我們絕不滿足於祇獲得我們全部人權中的一點點兒，或祇稍微少一點點兒。我們有權要求得到屬於一個生而自由的美國人的每一項權利，無論是政治的、公民的還是社會的，在我們還沒有得到這些權利以前，我們決不停止抗議，決不停止向美國人大聲疾呼。我們所從事的鬥爭不是單爲我們自己，而是爲一切真正的美國人。」

在一九一二年，杜波依斯的聲音就像曠野中的聲音一樣。甚至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同仁們也想禁止談這樣的話。「前進」；是的，要前進，但是要「一步一步地走」。當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真的出來揭發和報道私刑事件的時候，許多「老好」人遺憾地退出了。但是，由於喬埃爾·斯平加恩是執行委員會主席，杜波依斯就能夠自由地揮舞着「危機」，像一把利劍一樣地刺穿「無知」「愚昧」和「淡漠」的壁壘。這兩個人都相信語言的力量，相信偉大的作品是對人類有很大貢獻的作品。他們兩人年歲相若，而且性情又很相投，因此，他們之間產生親密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對於他們說來，這種友誼是罕有的。這是杜波依斯對白種人美國總宣戰的時期。他驕傲地拒絕了任何他認為對他是有「特殊」目的的提議。斯平加恩一定也有同樣的硬骨頭，則有他自己的理由。他的弟弟阿瑟·斯平加恩曾經對我說，這兩位朋友交談時所用的親暱的字眼如果出諸他人之口，他們是忍受不了的。他們在一起很愉快。斯平加恩聽到第四十四街舊市立俱樂部（他是會員之一）曾拒絕一個黑人在餐廳用餐，他立即和杜波依斯一道到那裏去用午餐。當時紐約市中心沒有一家餐廳接待黑人，顯然這兩個人是專門去找麻煩的。據說後來他們兩個都沒有真正地享受那一頓豐盛的午餐，因為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喬埃爾·斯平加恩就申請軍官的委任狀並獲得了批准。他被派到華盛頓的情報司去。他立即就碰到了軍隊種族隔離的複雜問題。全國各地都有不滿的意見。由於美國實際上處在戰爭狀態，斯平加恩少校似乎不能自由行動。後來，主要是經過他的努力，專門訓練黑人軍官的軍營成立了。但是，他知道必須有一些能够注意黑人兵士的待遇的黑人担任高級職務。他推薦了適當的人選：威廉·愛·柏·杜波依斯。

因為民心——甚至黑人的心——很重要，這個建議順利地被採納了。杜波依斯愉快

地到華盛頓去見他的朋友。在高級軍官的會議上他給了人們一個良好的印象。斯平加恩建議給他一個少校軍階，和他自己的軍階一樣。後來他們認為這個軍階太高了一些。杜波依斯接受了上尉軍階的職務。他們叫他回到紐約去等待委任狀。

委任狀沒有發下來，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為軍方立即就知道了它要容納到它的隊伍中去的是一個危險的黑人激進分子。有人指出，這個人會反對布克·華盛頓，並公開提倡黑人與白人「社會地位平等」。全盤計劃就此悄悄作罷。斯平加恩被派到歐洲前線去了，杜波依斯還是編他的「危機」。

在後來的幾個月中，「危機」的銷數超過了十萬份，在那時，這個數字是黑人出版史上空前的事件。我還記得我的父親如何熱心地等待着他的那一份雜誌，他如何對我和我的兄弟們高聲唸杜波依斯寫的鼓舞人心的社論。我也記得我是如何屏息地聽着。

又過了若干年。有一天，我鼓起勇氣把一首詩投到「危機」去。這首詩會得到我的英文老師的稱讚並曾在我們高等學校的刊物上登載過。當我從「危機」的光滑潔白的書頁上讀到我的詩時，我真不知道有沒有任何刊物能像它這樣使我感到自豪，而當我讀到編者的來信時，我所得到的快樂和啓發也是無可比擬的。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個現在已是舉世聞名的簽名：威·愛·柏·杜波依斯。